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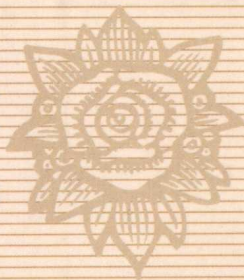
教育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jiaoyu qianyan wenti yanjiu congshu

主 编 陈 洛 副主编 唐晓萍 王兴辉 张进清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专 题 探 微

罗勇岐 著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ZHUANTI TANWEI

本丛书由广西教育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教育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jiaoyu qianyan wenti yanjiu congshu

主 编 陈 洛 副主编 唐晓萍 王兴辉 张进清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专 题 探 微

罗 勇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ZHUANTI TANWEI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教育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探微

罗勇岐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 530022

电话: 0771-5865797 5852408 (邮购)

本社网址 <http://www.gxeph.com>

读者电子信箱 book@gx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5.75 印张 170 千字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5-4791-9/G·3847 定价: 1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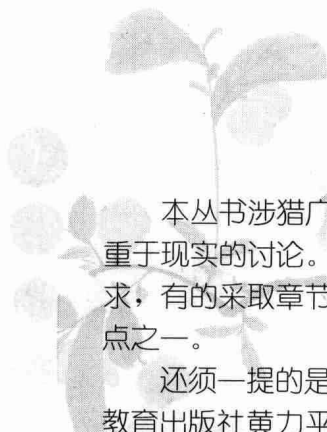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当前，中国教育正处在急剧变革的整体转型时期，转型期的教育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教师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任务前所未有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广西教育学院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性关键时期，学院领导班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新型教师教育机构为目标，经多次研究决定，精心选择学院一些在教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学人的力作，编辑出版“教育前沿问题研究丛书”。为保证丛书的出版，学院成立了“教育前沿问题研究丛书”编委会。编委会由一批高水平的教育专家和学者组成，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为编委会主任，以保证丛书的学术质量。同时，学院还设立了“广西教育学院出版基金”，以保证丛书的如期出版。

“教育前沿问题研究丛书”所收学术著作，皆是广西教育学院的学人们在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园地上辛勤耕耘的劳动成果。广西教育学院的历史，可上溯至 1953 年的广西省中等学校教师进修学校。五十余年沧桑，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广西教育学院已从当年蹒跚学步的孩子成长为壮硕的大人，步履稳健地行走在威武雄壮的教育大军中。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也。“教育前沿问题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是广西教育学院科研成果的整体展示，它将激励全院广大教师刻苦钻研业务，总结和推广教育教学经验，提高教学水平。同时，对于推动我院教育改革，促进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教育质量，也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本丛书涉猎广泛，跨度较大。有的侧重在问题研究，有的侧重于现实的讨论。为张扬个性，丛书在体例和格式上不作统一要求，有的采取章节体，有的则是论文结集体，这也是本丛书的特点之一。

还须一提的是，本丛书从选题到撰写、出版，都得到了广西教育出版社黄力平副总编辑的指导和支持。在本丛书付梓之际，谨向各位著者、广西教育出版社的黄力平副总编辑和编辑出版人员，以及一切关心、支持这套丛书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限于时间、经验和水平，丛书中所存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海涵并指正。

“教育前沿问题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6年5月

前言

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运动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性、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本书是作者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程的专题教学和工作实践中，紧密联系广西实际，进行深入思考的一部分学习心得和科研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时序，全书分设四个篇目，第一篇《毛泽东思想与广西革命斗争实践》；第二篇《邓小平在广西的革命建设品格》；第三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广西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第四篇《科学发展观与广西区域发展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的伟大创举，而《概论》则是一部完整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科学思想体系。“专题探微”仅仅是个人的局部观察与思考，并非专题乃至《概论》的全部。若要全面领略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貌、完整准确地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单靠“探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经过辛勤的耕耘。

作为教育的前沿问题，本人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某些方面紧密联系地方实际，努力回答一些现实问题。这份付梓的“探微”便是引玉之砖，祈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作者

2006年12月

目录

第一篇 毛泽东思想与广西革命斗争实践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新论 (1)
- 第二章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龙州起义及其特点 (9)
-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光辉实践 (16)
- 第四章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在广西的
胜利 (23)

第二篇 邓小平在广西的革命建设品格

- 第一章 早期邓小平的思想特色及其革命风格 (51)
- 第二章 早期邓小平的建党思想及其党建实践 (62)
- 第三章 中国—东盟教育服务贸易的理论依据 (71)
- 第四章 理想·信念 教训·经验 (82)
- 第五章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与特色 (115)

第三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

广西党建“新的伟大工程”

- 第一章 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尝试 (120)
- 第二章 抓典型,引导向,唤起民众同心干 (129)
- 第三章 掌握“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理论 (137)
- 第四章 地方高校必须以先进文化为发展方向 (143)

第四篇 科学发展观与广西区域发展实践

- 第一章 打造西南出海通道枢纽新城区 (151)
- 第二章 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 (159)
- 第三章 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166)
- 参考文献 (172)
- 后 记 (173)



第一篇 毛泽东思想与 广西革命斗争实践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 历史必然性新论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需要，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需要。可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并未达成共识。许多文章在论及党的产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时候，只是论及近代中国历史的需要，而没有直接说明党的产生是中国工人阶级要求组织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结果。有的社会思潮借此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缺乏阶级基础，歪曲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历史是非问题。

第一节 近代中国工人运动是 “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

近代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具有这样一种趋势：工人人数由少到多，斗争规模由小到大，运动的组织程度由低到高，斗争的性质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越来越向自觉的政治斗争发展，且有的地方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伴随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的企业的扩大，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外资企业、“官办”企业和民资企业里，近代中国产业工人起初仅是10万人左右；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已达到近百万人；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五四运动前夕，全国产业工人猛增到200余万人，加上手工业工人、店员、码头工人和苦力工人，人数将近1800万。人数发展趋势说明，“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多了，它被集结为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这个力量……工人们开始组成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集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工资”。

斗争规模也呈现由小到大的趋势。先是罢工次数日趋频繁，然后是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的提高。近代中国工人运动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50年代最初的工人罢工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阶段工人的斗争基本上还是本能地进行反抗经济剥削和对生产工具的报复阶段。正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甚至仅仅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的阶段。斗争的特点基本上还是一种分散的无组织的行动，“没有自己的关于阶级利益和劳资关系的明确概念”。这个阶段不仅同盟罢工为数不多，类似上述性质的罢工次数也不多。工人的组织带有封建性的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的性质，斗争的内容基本上是经济斗争。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外国资本主义，这不能不说它带有一定的反帝政治斗争色彩。例如，1858年香港、澳门2万多市政及搬运工人为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而进行的罢工斗争，1848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船舶工人拒绝为法帝国主义修理被击伤的兵舰，以及其他各行业工人同时拒绝为法国人服务等斗争。这一点说明中国工人运动起点是较高的。第二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的五四运动。这一阶段工人的斗争特点是“真正对政治、经济有影响，并引起社会注意”，其表现是罢工次数频



繁，参加人数增多。据统计，从1912年到1919年5月，罢工次数多达130次，平均每年发生的次数，由这之前的3~4次，增到16次；仅1919年一年，有记载的罢工就有26次，参加人数多达91000人；有的厂矿企业一次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数千人。这个阶段罢工持续的时间也较长，组织程度也较高，出现了跨行业的同盟罢工。1914年发生的上海招商局、怡和、太古三个轮船公司海员同盟罢工，1915年、1916年苏州织机工人连续两年举行的全行业罢工。这种形式表明斗争“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运动已经初步具有自己的阶级队伍。1916年，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反对法帝国主义侵占天津老西开的罢工斗争，并取得部分胜利，也是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有力证明。第三阶段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一阶段工人阶级显示了自己的巨大威力和作用，让公众刮目相看和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五四运动的“六三大罢工”最能说明这个阶段工人斗争的特点。

上述工人阶级队伍及其运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说明，斗争不仅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冲突的性质，而且工人阶级要求“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要求更高程度地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战斗，这是由其历史任务决定的。

第二节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要求组织起来 “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近代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起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这个特殊的规律和地位决定了它与生俱来就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其所受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少见的。中国工人阶级被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底层，这种政治经济地位一方面使工人阶级具有



强烈要求改变地位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对政府帮助中外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一目了然。工人阶级经过屡次斗争的实践，切身感觉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同时还由于中国工人阶级身受三重压迫，不存在工人贵族阶层，也就不存在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除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一旦有了先进的科学思想指导，他们就能够克服自身弱点，走向革命、走向联合斗争的道路，使自己的队伍迅速地成长和发展起来，作为整个阶级来行动。此乃其一。

其二，高度集中的优点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向联合斗争的天然条件。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工人阶级不是首先产生于本国民族小工业的手工作坊，而是产生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官僚开办的企业，这种企业一开办就使用机器并具备一定的规模，中国工人阶级一诞生就集中在较大的企业里。即使后来民族资本工业出现，由于所占比重不大，仍然以外资和“官办”企业为主，工人仍集中在这样的企业里。例如，1894年雇佣500人以上的工矿企业共39家，而民资企业仅15家，大企业仍占大半以上。当时，帝国主义开办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中国少数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和大城市，随后的官办和民办企业也在这些地方相继兴办，使得工人队伍又在这些地区聚集。1894年，仅上海、汉口、广州三个城市的工人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更为集中，约占46.4%。近代中国产业工人阶级高度集中的天然特点，带来了他们的联合。这种联合又为不断发展的交通工具所促进，大工业造成的如铁路、轮船等交通工具使不同地区的工人更易于互相联系起来，形成更大的联合。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点说明，尽管中国工人阶级还年轻，受大生产陶冶的时间也较短，但他们由于一诞生就在大企业里，养成了集中生产、团结协作和共同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优良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斗争、共同行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先天造就的阶级本能。同时在斗争



实践中也使中国工人阶级感到团结战斗才能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从易于走向联合。这也是这个阶级队伍的内在要求。从后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首先在工人阶级集中的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天津、济南等地建立，并逐步由沿海到内地，由沿江、交通较发达地区到较偏僻地区发展起来的事实看，上述结论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运动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除此之外，中国产业工人大都是从破产的农民队伍中演变而来，他们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广泛联系，这个特点不仅反映了工人阶级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说明它倾向于广泛的联合斗争的趋向。

总之，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证明，这个阶级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以反抗压迫者的姿态进行着战斗，尽管开始是自发的、带有经济斗争的色彩；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很快就会走向自觉，走向联合，直至要求“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进行阶级的斗争即政治色彩的斗争，这是它的阶级本能和内在驱动；加之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它必然迅速地以独立的姿态，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阶级基础。

第三节 五四运动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上述趋势和特点说明，要求组织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即建立自己的先锋队组织，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内在要求。但是，这种阶级的需要的自然结果还不一定组成阶级的先锋队，而仅仅是工联组织。因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司令部，只有工人斗争发展成为阶级斗争的时候，建党才成为必要。可见，要使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成为事实，还有一个过程。促进和加速这个过程，就是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这两个伟大的



历史事件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特别是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运动中发生的“六三”大罢工，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运动已经进入了阶级斗争的阶段。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印证：

首先，“六三”大罢工是全国范围工人阶级自觉的联合行动。这次罢工第一次打破了行业和地区的界限，先是上海开始罢工，很快便席卷全国。几天工夫，上海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达5万~6万人，加上店员和码头工人不下10万人。南京、杭州、九江、唐山、芜湖、武汉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如此大范围、大规模的全国性行动，是近代中国工人运动前所未有的。而且罢工已经不再局限于先前的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的形式，工人的团结和联合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其次，“六三”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发动起来并且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关于这一点，争论的焦点在于这次大罢工是不是工人阶级独立进行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六三”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追随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完全是出自工人阶级的自愿和主动。他们参加罢工斗争不但不是资产阶级发动的，相反却是冲破了资产阶级的束缚和阻挠之后实现的。当时的报纸指出了这个事实：“虽亦有与商学两界接洽者，然其他则均出于自动”，“我们不否认在工人当中确有一些鼓动者，可是从事鼓动的人并不是学生，而是出现于工人之中”。而当罢工达到高潮，危及统治当局时，资产阶级却出来阻挠，遭到了工人群众的反对。据记载，上海钢铁机器匠公所、上海海员与各轮船公司的工人群众都是冲破资本家当局的阻挠而坚持罢工到底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领导了“六三”大罢工，工人阶级是在斗争中遵循了资产阶级的主张行事的。而历史事实是工人阶级在大罢工中跟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指引的政治方向走。在罢工运



动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而且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还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但运动进入罢市阶段之后他们就消极起来了。罢市不久，民族资产阶级立即提出“切勿暴动”“守秩序”“文明抵制”等消极口号。1919年6月9日，上海商界罢市没几天，上海总商会便发出劝导开市的通告。而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主张和表现却与此相反，罢工之初，工人就提出了“格府政之心，救灭亡之祸”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要求罢免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进而又发展到与资产阶级的开市劝导相抗衡，并明确表示不达目的，工界同仁“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6月12日，上海工人集会时又提出新的要求，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政府和外国资本主义。这与五四运动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提出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这说明工人阶级的“六三”大罢工与先进知识分子指引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行动是自觉的行动。

再次，“六三”大罢工中工人阶级确实有了建立自己阶级组织的愿望。尽管“六三”大罢工组织上是分散的，还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但是罢工一开始工人就表示了建立自己的组织机构的愿望。6月5日，上海码头工人在酝酿罢工时就提出愿“与工人的领袖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6月11日，上海工界召开万人大会，也提出了成立中华工界全体大会的主张，并致电全国工界取得一致行动等。“六三”大罢工过后，尤其是在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更是以种种方式表示了祈望有人为之指路的要求，有的寄希望于知识阶层，盼望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同他们打成一片，学点知识。有的崇尚“知识道德”，企盼以此指导消除种种不平等，使工人脱离苦海。正是这些，表明了在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孕育着强大的要求组织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萌动，加之五四运动的“六三”大罢工，迫使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



贼的职务，使爱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和作用，这就引起了世人瞩目，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及其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尤其是引起了关心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和列宁的重视。列宁曾经预言，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于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下，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便成为现实。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诸多因素中，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需要是党产生的内在要求，这是第一位的条件，是不能小视的。



第二章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 龙州起义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自然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南。但是中国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革命道路如何走，没有现成的答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伟大探索，最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了全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一个萌芽、产生、成熟和发展的过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广西的龙州起义，正是这一伟大探索的一次成功尝试，因带着鲜明的历史特点被载入史册。

1930年2月1日，由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组织发动的龙州起义，是继百色起义之后，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我国西南边疆地区领导的又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很出色，争取了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又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历史特点。

第一节 龙州起义的发动

龙州起义爆发于大革命失败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期。这一时期党所领导的许多武装斗争，都带有“以军事发展暴动”，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特点。而龙州起义则是在国民党广西上层进步军人与我党建立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之